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2.07.001

全球供应链安全形势对中国外贸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 路红艳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摘 要: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凸显,对我国外贸发展带来了综合成本上升、产业链和订单转移等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我国采取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策略,多措并举稳定和畅通外贸供应链,提升外贸综合竞争力,促进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

关键词:全球供应链;供应链安全;外贸供应链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扰乱了各国生产生活秩序,导致全球供应链受损,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引发了世界各国和跨国公司对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关注,进而出现了一些国家以政治和意识形态划线分割、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全球供应链重构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枢纽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必然对我国外贸供应链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全球供应链安全形势变化对我国外贸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我国外贸供应链稳定,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供应链安全的界定与内涵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全球供应链网络结构日趋复杂,供应链脆弱性不断增加,供应链安全(supply chain security,SCS)作为企业供应链风险管理策略的一个特定类型逐步被重视起来。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供应链安全被重新定义,防止犯罪和恐怖袭击成为供应链安全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府开始关注供应链承受恐怖活动等突发事件打击的能力。2012年美国发布《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后,供应链安全的概念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进一步成为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关注重点。但总体来看,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理论界对全球供应链安全概念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供应链脆弱性、供应链弹性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蔓延后,供应链安全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从原来关注供应链的脆弱性和弹性上升到关注供应链的自主性、完整性方面。

具体而言,供应链安全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从产品生产到物流、贸易等各个供应链环节正常运行,并能够抵御外来各种因素带来的威胁、损失或中断的风险,实现稳定持续发展的状态。从能力角度看,供应链安全要求具备三种能力:一是对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控制能力,并能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和竞争力;二是对各种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和抗衡能力;三是对供应链中断能够及时快速修复的能力。从风险角度看,供应链安全主要考察供应链链条是否有因突发事件造成的中断风险,供应链关键环节是否有因严重对外依赖造成的断供风险,以及供应链稳定性、整体性是否有因企业供应链转移可能造成的断裂风险。

[作者简介]路红艳(1976—),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全球供应链、市场流通。

二、全球供应链安全形势变化

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自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形成了高度复杂、相互依赖的供应链网络，任何一个环节不畅或中断都会导致全球供应链风险。以往全球供应链的风险主要源于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如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曾一度引发全球汽车供应链中断和混乱。而随着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事件不断出现，全球供应链风险凸显，对全球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受到冲击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奉行贸易保护、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其加征关税和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导致国际贸易和全球商品流通受到严重影响，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并成为重塑全球供应链分工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疫情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21年度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报告》显示，2021年，20个国家（地区）共计发布4071项措施，同比增长16.4%，共涉及91个两位海关编码，占全部98个两位海关编码的92.9%，涉及农产品、食品、化学品、药品、机械设备、运输设备、医疗设备以及特殊交易品等。受俄乌冲突影响，粮食保护主义导致多国实施粮食出口禁令，全球农产品供应短缺状况堪忧。据统计，截至2022年5月中旬，全球实施粮食出口禁令的国家约有20个，包括俄罗斯、印度、印尼、伊朗、土耳其、乌克兰等。同时，发达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对国际经贸秩序和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如欧美国家在芯片技术、发动机技术、工业软件等一系列尖端领域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在关键技术领域实行出口限制或服务限制，对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如在芯片领域，由于欧美国家实行科技封锁、对重要商品垄断、打压别国实体企业等行为，导致全球芯片供应链中断，进而导致汽车、手机、电脑以及其他智能设施设备等行业因为芯片供给中断而被迫减产甚至停产。

（二）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加深，排他性“供应链联盟”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逐步签署和实施，以高标准、广覆盖、严要求为特征的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加速重构。根据WTO区域贸易协定信息系统RTAIS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月，向WTO通报并正在实施的双边和多边区域贸易自由协定共有496个，而在2000年FTA总数仅有98个。特别是2018年以来，随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加墨协定》（USMCA）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相继签署和实施，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要力量。这些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不仅通过区域内降低关税甚至实施零关税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而且通过一系列高标准、排他性措施构筑了对区域外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形成排他性供应链联盟。如在原产地规则方面，USMCA、CPTPP均专门针对纺织服装产品设定了“从纱开始”的原产地标准，CPTPP要求非原产纤维和纱线重量不能超过使用该原料部件重量的10%，而非一般贸易协定中规定的货物总重量的10%。USMCA将享受零关税的汽车及其零部件产品本地价值最低比重标准由62.5%调高至75%。同时，为实施印太战略，2022年5月23日，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韩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12个国家加入。该框架虽然不是自贸协定，但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贸易合作、供应链合作、清洁能源合作、税收和反腐败领域合作。其中，在供应链合作方面，主要是美国计划建立一个供应链预警系统，增强原材料、半导体、关键矿物和清洁能源技术等关键供应链领域的可追溯性，满足参加国合作推进生产的多元化布局。其供应链“多元化”实质就是“去中国化”。虽然由于“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特别是东盟国家有战略自主的考量，不会完全跟随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但不排除美国联合日本、韩国等国家采取非市场化手段，通过“政经捆绑”以及直接补贴等方式扭曲和人为切割供应链，给全球供应链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三）俄乌冲突及引发的全面制裁，加剧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原本已不堪重负的全球供应链受到了巨大冲击。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GDP占全球比重虽然仅为1.95%，但其是全球关键的原材料、粮食和能源供应地，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占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10%和19.1%。俄罗斯的钯供应量占全球40%，乌克兰的氖气供应量占全球70%。同时，俄乌两国葵花籽产量占全球葵花籽产量的比重约为60%，两国出口的玉米、小麦占全球出口的比重高达18.6%和28.5%。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采取的反制措施，一方面，使全球原油、天然气、钢铁、各类有色金属、化肥及粮食等多个重要大宗商品供应链陷入混乱状态，导致能源、金属及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并通过影响原材料供应，渗透到中下游的产品制造，使疫情冲击下原本已短缺的商品供应更为紧缺，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如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英国相继出现了奶粉、食用油短缺现象，引发了社会恐慌。另一方面，使西方一些国家将自由贸易和价值观挂钩，试图重塑多边贸易体制。如以“五眼联盟”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与价值观不和的国家做贸易就是支持对方”。2022年4月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和彼得森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公开演讲中提出要“实现自由但安全的贸易”，应该与“可以依赖的国家”进行贸易。因此，价值观和供应链的脆弱性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重构国际贸易格局的考量因素，并将使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根本性冲击，加剧全球供应链风险。

（四）中美对抗与竞争持续加剧，全球供应链被人为扭曲和重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主线。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加征关税，不仅使中美贸易收缩，美国降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也推动中国部分产业加快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美国不仅在中国利益敏感度最大的经贸、高科技、产业链领域发起对华“脱钩”行动，而且推动在华美国企业回流、采取强化意识形态施压、纠集国际联合阵线等手段，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孤立和打压中国，使中美对抗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如在半导体领域，美国为保持其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垄断地位，一方面，通过将我国半导体企业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限制我国半导体产业崛起。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拉拢日韩，试图构建“去中国化”的半导体联盟。2021年4月，美日首脑就半导体供应链的合作提出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共同研究半导体产业的联合研发和产业分工。2021年5月，美韩首脑宣布两国通过促进相互投资和研发合作，支持先进半导体制造业发展。同月，美国还联手日本、欧洲、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共64家企业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联合支持半导体研发与制造。此外，美国还与日本协同制定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意图切断部分高技术半导体产品及相关技术、设备与材料对我国的供应。2022年以来，美国又通过《2022美国竞争法》草案，联合日本、韩国和台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围堵中国，阻滞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

三、对中国外贸供应链的挑战

我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世界各国都高度依赖我国外贸供应链。在全球供应链风险日趋凸显的形势下，我国外贸展现出强大韧性，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和2019年分别增长21.4%和23.9%；2020-2021年，进出口总额两年平均增长11.22%，显著高于2020年的1.9%和2019年的3.4%。但进入2022年以来，受国内疫情多点爆发，物流运输、供应链压力增大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我国外贸增速放缓，外贸供应链面临成本持续上升、订单转移、关键产品进口受限等多重挑战。

（一）外贸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综合成本上升压力加大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受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原材料价格上涨、海运运费高企，加之港口拥堵、集装箱“一箱难求”的局面，已导致外贸企业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俄乌冲突爆发后，叠加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反复，物流迟滞、原材料涨价、零部件断供等问题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外贸供应链成本上升。一是受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

影响，外贸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出现了“出口不增收，增收不增利”问题。二是国际海运和空运价格攀升，中小外贸企业与物流公司供需信息不对称，运价成本一直维持较高水平。如以往货物从中国运到美国一标准箱的价格是2000~3000美元，而目前涨到2万多美元。三是物流不畅形势较为严峻。一方面，受疫情以及美欧与俄罗斯互相关闭领空、乌克兰关闭港口、土耳其关闭海峡等行为影响，国际物流效率明显降低。如以往从中国运输货物至美国海外仓一般需要25天，而目前需要50天至60天，时间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受俄乌冲突以及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制裁影响，中欧班列改道运行，也导致铁路物流效率也有所下降，影响中欧贸易发展。此外，受国内主要城市疫情影响，港口码头、机场、跨境货物运输作业点防控措施提档升级，海运船期拉长，进出口货物积压，也进一步增加了外贸企业成本。

（二）产业链和订单转移加快，“贸易替代”风险加大

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成本国家向低成本国家转移是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近年来，受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已呈现出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并在部分产品领域东盟对中国形成了贸易替代。根据UNComtrade数据库统计数据分析显示，在

表1　2017年和2020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占比下降且自东盟进口占比上升的产品情况

HS2位码	产品	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比重（%）	2020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比重（%）	2017-2020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占比变化（%）	2017年美国自东盟进口占美国进口比重（%）	2020年美国自东盟进口占美国进口比重（%）	2017-2020年美国自东盟进口占比变化（%）
42	皮革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动物肠线（蚕胶丝除外）制品	57.23	29.51	-27.72	16.49	32.84	16.35
65	帽类及其零件	64.29	49.09	-15.21	11.07	15.65	4.58
46	稻草、秸秆、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篮筐及柳条编结品	58.25	43.87	-14.38	25.48	31.86	6.38
94	家具；寝具、褥垫、弹簧床垫、软座垫及类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灯具及照明装置；发光标志、发光铭牌及类似品；活动房屋	52.02	38.64	-13.37	11.61	25.85	14.24
64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55.77	42.57	-13.19	29.01	41.54	12.53
60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44.89	32.43	-12.46	1.30	1.66	0.35
85	电气机械和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和复制机；电视图像和声音记录器和复制器，此类物品的零件和附件	42.14	33.33	-8.81	14.73	21.61	6.88
61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32.54	24.44	-8.09	27.60	33.31	5.71
70	玻璃和玻璃器皿	40.65	34.18	-6.47	2.44	3.23	0.79
69	陶瓷制品	39.25	32.99	-6.26	4.80	6.03	1.23
95	玩具、游戏品、运动品及其零件、附件	81.71	76.56	-5.16	4.28	8.98	4.70
62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35.73	30.96	-4.77	22.54	27.69	5.15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	32.19	27.78	-4.41	6.54	8.46	1.92
58	特种机织物；簇绒织物；花边；装饰毯；装饰带；刺绣品	40.70	36.36	-4.35	3.02	6.16	3.14
83	金属；贱金属杂项产品	43.57	41.55	-2.02	2.54	3.81	1.26
49	书籍、报纸、印刷图画及其他印刷品；手稿、打字稿及设计图纸	49.92	49.25	-0.67	2.11	4.97	2.86
66	雨伞、太阳伞、手杖、坐杖、鞭子、马具；及其零件	93.00	92.89	-0.11	0.96	2.12	1.16

数据来源：UNComtrade。

HS两位编码的87类制造产品中，与2017年相比，2020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占其该类产品总进口比重下降的有67类，其中降幅大于1%的共50类，降幅大于5%的共27类。在202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占该类产品总进口比重超过20%的产品共29类，其中，18类产品进口占比较2017年明显下降，主要集中在皮革制品(HS42)、帽类(HS65)、草类编织品(HS46)、家具及照明装置(HS94)、鞋类(HS64)、针织物及钩编织物(HS60)等方面。同时在这18类产品中，除铁道及电车设备(HS86)外，其余17类产品美国自东盟国家进口占比均上升(见表1)。

2022年以来，随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生产加速恢复，而我国国内部分城市因为疫情无法正常复工复产，外贸订单呈现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趋势。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4月对500余家参加广交会企业的调研，47.2%的企业在手订单较上年春季和秋季均有所下降，仅有12.6%的企业表示订单同比增长。而越南工业与贸易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4月，越南货物出口额达到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25%，前四个月累计出口1224亿美元，同比增长16.4%。其中，越南服装出口势头强劲，当地许多纺织企业订单已排到今年第三季度。在这种形势下，外贸订单转移不仅会加速东南亚等国家对我国的“贸易替代”效应，而且可能导致部分企业加速削减在中国的生产计划，将生产线向其他国家转移，加速产业链向外转移步伐。

(三)关键技术和产品进口受限，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加大

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升期，在这一阶段，如果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产品，弥补产业链短板，就可以为我国自主研发争取时间，进而使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但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对我国重点行业供应链进行围堵，试图降低对我国供应链的依赖，甚至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目前，我国在芯片、操作系统、发动机、精密仪器以及重大装备、重要材料、关键元器件等领域仍然严重依赖进口。如在变速器、发动机和电子电气等汽车零部件领域，我国严重依赖从日本进口，2020年我国从日本进口的这三类汽车零部件占我国该类零部件进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0%、42%和21%。在关键材料领域，我国与韩国、日本在包括半导体材料、导电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磁性材料、光电子材料等在内的电子材料方面的贸易逆差常年维持在10亿美元，与美国相关产品的贸易逆差也近4亿美元。在美国联合盟友打压、围堵我国重点行业供应链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中国出口管制，甚至与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采取出口管制协同行动，可能造成半导体、新能源、医药等行业关键技术和产品断供，危及产业链安全，使我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甚至将我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之外。

四、应对策略及建议

我国外贸面临的全球供应链堵点、痛点不断增多，外贸供应链畅通的瓶颈问题日益显现，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外贸发展的突出问题。当前，为稳定外贸增长，我国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稳定外贸产业链供应链、促进外贸货物运输保通保畅、加大金融支持和出口信贷等等，对促进外贸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因素来看，全球供应链在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运转，而且长期可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因此，要坚持短期与长期相结合，既要着力解决当前外贸供应链面临的堵点和突出问题，也要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贸易领域安全防范，增强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供应链安全的能力。

(一)提升外贸发展的产业链能力

产业是外贸发展的基础。在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上升的形势下，我国要持续增强外贸供应链的韧性，应着眼长远，以产业链供应链为抓手，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一是以创新为动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进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标准，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品牌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贸易结构优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二是保障“贸易替代型”行业产业链的完整性。采取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工人居住成本等措施，提

升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存能力。三是推动外贸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我国数字经济领先优势，以智能工厂建设为抓手，推动外贸生产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提高企业柔性生产和智能制造能力，更好适配市场需求。

（二）畅通外贸货物物流运输通道

针对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物流、供应链梗阻，近期要着力疏通海空港等集疏运，提高进出口货物装卸作业和通关效率。鼓励外贸企业与船运、航空、铁路运营方以及货代企业面对面对接，推动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建立稳固合作关系。协助外贸企业解决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供应、物流运输、进出口通关等问题，及时修复外贸企业上下游供应链，增加有效供给，确保外贸企业生产经营及供应链正常运转。中长期要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加快推进贸易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陆路及海上通道建设，建立海外通道保障基地，多方向、组合式打通能源资源运输通道，提升重要物资、能源大通道国际物流服务能力。鼓励海运物流企业向港口运营管理、集装箱生产、生产加工等上下游延伸拓展，健全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增强“海运定价权”。支持海运物流企业开展港口、物流、贸易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全面参与全球供应链重构，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三）推进关键产品进口来源多元化

针对美国联合盟友围堵我国高科技产业链的形势，要积极研究重点产业链国际分工格局，加强与产业链上重点国家合作，持续构建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多元化进口格局，掌握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动权，尽量避免形成对某一个进口来源过度依赖的局面。同时，针对俄乌冲突可能导致的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要在继续稳定原有粮食和能源贸易伙伴的同时，积极寻求多元化的替代粮源，保障能源供给，维护粮食和能源安全。

（四）加强外贸供应链国际合作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多国经济前景和政策走向存在不确定性，全球贸易全面复苏仍面临风险。在这种形势下，要坚持更高水平开放，全面深化国际合作，构筑互利共赢的外贸供应链合作体系。一是推动RCEP深入实施，积极推动加入CPTPP和DEPA进程，更新或升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自贸协定，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扩大外贸发展空间。其中，要特别重视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在初级产品、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上的相互依赖程度较深，且都已深度融合到亚洲供应链体系中。要在深入实施RCEP过程中，加强与日本、韩国合作，进一步促进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推动中日韩三国全方位提升贸易与投资合作水平。大力发展与东盟国家中间品贸易，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巩固提升东盟各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跨国物流、绿色低碳等领域国际合作，降低供应链壁垒，建立更具韧性的外贸供应链。三是发挥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重大经贸展会的作用，优化创新线上办展模式，帮助企业拓展出口市场，促进企业获取更多订单。

（五）健全外贸供应链风险防控体系

针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发达国家试图重构多边贸易体系、人为扭曲和扰乱全球供应链的形势，我国在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同时，一方面，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完善对外贸易、出口管制等相关立法，严格出口管制调查执法，开展产业竞争力调查与评价，健全贸易摩擦预警体系、贸易救济调查工作体系和技术进出口管制体系，妥善应对部分国家滥用出口管制等歧视性行为。另一方面，加强对重点外贸企业分类指导，提高企业应对和防范贸易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J].学习与探索，2020(4)：79-89.

[2]林梦，路红艳，孙继勇.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趋势及我国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20(10)：19-25.

[3]顾学明，林梦.全方位构建后疫情时期我国供应链安全保障体系[J].国际经济合作，2020(5)：4-15.

[4]路红艳，林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路径[J].中国国情国力，2021(3)：23-26.

[5]陆燕.全球供应链梗阻下的中国外贸形势解析[J].人民论坛，2022(1)：66-70.

[6]杨继军，金梦圆，张晓磊.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考量与中国应对[J]..国际贸易，2022(1)：51-57.